

鲁迅文集

二心集

第十一卷

鲁迅 原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鲁迅文集

二心集

第十一卷

鲁迅 原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 泓

封面设计:尚升广告

鲁 迅 文 集

鲁迅 原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0

字数:20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ISBN 7 - 80702 - 272 - 8/ I 29

定价:248.00 元(全 18 册)

目 录

序言	(1)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4)
习惯与改革	(22)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4)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27)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9)
我们要批评家	(34)
“好政府主义”	(36)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38)
《进化和退化》小引	(40)
《艺术论》译本序	(42)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58)
柔石小传	(60)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80)
答文艺新闻社问	(81)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82)
沉滓的泛起	(92)
以脚报国	(95)
唐朝的钉梢	(97)
《夏娃日记》小引	(98)
新的“女将”	(100)

宣传与做戏·····	(102)
知难行难·····	(104)
几条“顺”的翻译·····	(106)
风马牛·····	(109)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111)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114)
《野草》英文译本序·····	(116)
“智识劳动者”万岁·····	(117)
“友邦惊诧”论·····	(119)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121)
答北斗杂志社问·····	(122)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123)
关于翻译的通信·····	(127)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143)

二 心 集

序 言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麼,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

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见识,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为,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

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倒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伪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

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有是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 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

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 *Chemie* 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

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 ABCD 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

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已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在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于“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糊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分“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糊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思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思”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

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望。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

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